

区域经济增长的文化分析

——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的崛起

高彦彦, 杨德才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以分析温州文化对温州经济崛起的关键作用为基础, 进而一般地分析区域文化之于区域经济的作用。本文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纯主观的概念。温州经济的崛起的关键在于温州的文化, 但只有在其与制度环境相吻合时才能发挥经济促进作用, 否则文化的经济作用会被“锁定”。无约束的文化可能会扭曲经济, 因此需要政府的引导。

关键词: 文化; 经济增长; 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2006)02-0001-01

从上世纪 40 年代以来, 国外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已经对于经济增长源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丰富的著述研究了劳动、资本、技术、专业化和分工等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①。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之中, 认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

将文化纳入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之列可追溯到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 他将经济动机归结为极为复杂的心理, 并认为经济活动是植根于更广泛的社会习惯和文化道德之中。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特定文化(新教)是培养资本主义精神、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和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1]。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 以信任为主线, 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并借此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将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 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因素, 认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呈现出负相关, 即, 一个低信用度的社会, 需要更多的物质资本, 而高信用度的国家则相反^[2]。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也将文化因素予以高度重视: “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 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 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3]

国内的学者很早就关注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我国台湾学者魏萼认为“中国的贫困, 与长久以来存在的内忧外患固然有密切的联系, 然而其社会结构的本质与外来文明所带来的冲击, 其所产生的文化失调也是其致贫的主因”^[4]。他进一步认为, 我国的民族文化本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但其精神被扭曲, 而显示了文化的劣根性, 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刘晓凤、任卫锋把区域经济一体化放在一个文化连接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 指出在不断开放的全球背景中, 文化及制度的演进同区域概念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社会网络, 影响人们的观念、行为偏好、组织的效率和

收稿日期: 2005-08-18

作者简介: 高彦彦(1982-), 男, 江西瑞昌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发展经济学

① 参见: 邹刚. 增长理论的新进展[A]. 见: 汤敏, 茅于軾. 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40-62. 该文较系统地介绍了增长理论的演化历史并做客观的评价

社会资本的积累乃至可内生在经济发展方式中。其中共有文化信念(知识)的形成对提高区域整体的实力、声誉和增进相互信任起到重要的作用^[5]。

由此可见,考察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是有其现实和历史渊源的。但是,用文化来解释小区域的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文献仍然比较少。本文先将对文化进行一般化的定义,然后,结合温州文化分析区域文化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温州文化对于温州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有条件的,即区域文化与制度环境的一致性,否则,文化的作用会被“锁定”。

一、关于“文化”的界定

不同的学科对于文化的定义差别很大。但是,没有对文化经济界定就无法分析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文化”做出一些界定。

关于文化,本文专指某一地区的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并认同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内化于人们内心世界并反映在人们行动中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文化具有区域性特点并且是历史形成的。哈耶克认为文化是一种自然演化的结果,“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6],但又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的。文化的相对稳定性是指文化一旦形成,具有持续存在的特点,但这并不否认文化变迁的存在,而是一种相对稳定中的变化。文化必须是内化于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在人的行动中。文化的实施更多地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文化熏陶下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并指导着人们按这种观念行动。

本文的“文化”着重于强调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共同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而不是文化的具体形态,如民间特色、文人诗词、名胜古迹等。换句话说,本文强调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而非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笔者将从纯主观的角度来界定文化。这一点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化定义不谋而合。他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趋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7]。劳伦斯·哈里森将不发达归结于一种“心态”^①。高波和张志鹏在综合分析众多的文化定义后,将文化定义为:人们所选择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8]。由此可见,分析文化对经济社会进步的作用,将文化界定在人们的主观视角内将有助于分析。因此,将视角关注在人的精神面貌上,即抓住了文化的本质——人的共同的价值观。

二、文化对经济的作用

(一) 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方式

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的无形的过程^[9]。在此,文化——我们定义为共同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作用,通过指导着人的行为,对经济体产生复杂的影响。

图1显示了社会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方式从而分析对经济的作用方式^②。继承的文化(A)是指当代人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的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是指受社会结构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继承文化的变迁。结构环境(C)则指社会实践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包括失业、收入下降、资源压迫、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变化等。行为结果(D)是指人

① 关于这种观点的充分论述详见: Harrison L. E. *Un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M].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② 这张结构图借用了奥尔兰多·帕特森在《认真对待文化: 框架及非洲裔美国人实例》一文中的分析图。这篇文章收录在参考文献[7]之第297-322页。虽然分析的目的不同,但是,笔者认为可以用来阐释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

的行为产生的影响。首先，社会文化的决定因素是继承的文化模式（A）和结构环境（B）。个人结果包括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和行为结果（D）。社会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有不同的方式。继承的文化模式可以直接对个人的行为起指导作用，即图中的 A→D 过程。当引入环境结构因素（C）时，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发生变化。继承的文化受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后，产生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然后通过更改了的文化影响个人行为（D）。此时文化的作用过程为（A、C）→B→D。当然，社会结构环境（C）的变化也会直接对人的行为（D）产生影响，当人们发现自己的行为不与传统的文化模式相吻合时，便改变继承过来的文化模式（A），即产生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而这种新的文化模式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行为（D）。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文化作用方式：C→D→B→D。归根到底，文化都是通过“社会文化→个人行为结果→社会结果”这样一条路径对社会经济发生作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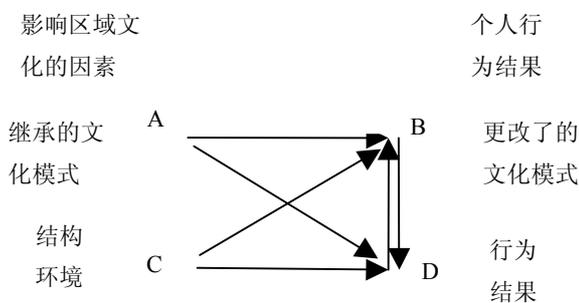


图1 文化模式、结构环境和行为结果的相互作用

文化的存在性，往往表现为该文化下的人们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产生出反映同一价值取向的行为。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温州人的行为都反映出相同的文化内涵。温州文化注定温州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安守本分墨守成规。如，早在 1956 年温州永嘉县便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温州人的商业精神使他们走南闯北，进行各种各样的薄利而且艰辛的小买卖。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的商业精神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一言蔽之，温州经济的发展过程的一贯行为印证了温州重商文化的存在性。

因此，根据前文关于文化的定义以及温州一贯性的文化特征，笔者尝试着将温州文化定义为温州人在功利主义思想和实用学说的长期的影响下形成的内化在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

（三）温州文化之于温州经济发展

温州文化对于温州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在于重商文化直接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励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从而促进温州经济的飞速发展。不难理解，这种文化作用经济的过程是一种“意识指导实践”的过程。

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无非是利用劳动力、资本、管理、技术四种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动力。但是，这四种因素无法用来解释温州经济的增长。温州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匮乏，国家资金援助很少，改革开放以前人均收入低，因此谈不上资本富裕。温州的劳动力虽多，但是劳动力的作用取决于人力资本，而温州大多数民营经济经营者的教育水平为小学和初中，因而，温州没有劳动力优势。另外，在很长时期内，温州企业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方式谈不上管理和技术优势。由此可知，温州经济增长是无法用一般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来解释的。而文化却恰好可以解释温州经济的崛起。

（二）温州文化

温州不是“文化的荒漠”。温州的文化从秦汉以来经过了“七次崛起”。最为称道的是南宋时期与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三足鼎立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以叶适为集大成者，倡导“事功之学”，反对空谈性理，讲求实效功利，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合一”，而非“以义抑利”。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强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和文化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的开拓进取追逐商业利润的行为便充分爆发出来。温州文化作用于温州人的结果是温州人追逐商业利润的行为。它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而且能够吃苦耐劳,敢于为经济利益而做出常人不能做出的努力。不论是投机还是办实业,只要能赚钱,温州人都会去干。从早期温州人办钱庄、到后来的“拾会”,从第一个家庭作坊到股份制企业,从国内市场到开拓国际市场,从制假售假到合力打假,再到最近温州的“炒房团”,都无一例外地表明温州人的商业文化。正是因为温州的文化在改革前后不同的时期反映在温州人的实践活动中,我们才可以说,温州有一种内在的持续的文化在指导着温州人的行为。

温州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反映在温州人的首创精神,以及由此引发的先发经济优势。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远远走在前面。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拥有许多发展民营经济的“第一”:如中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执照、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关于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法规、第一个实现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实现全社会养老保险和第一座农民城等。正是这种首创精神给温州经济发展带来“先发优势”。

虽然有不少的学者提到温州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无为”政府,我们不否认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无为”政府更多地只是一个条件,而非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温州许多抱着“改造资本主义”的信念的官员结果被温州改造了,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者,结果均成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10]。所以说,在温州经济起飞过程中是文化而不是政府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三、文化作用的条件和文化演变对于经济的作用

仅仅解释温州文化对于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还不足以让人信服。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温州文化存在于改革开放前后各期,为什么温州文化不能促进改革开放前温州经济的发展而仅使改革开放后温州的经济大放光彩呢?或者一般地说,同一文化对于同一区域在不同的时期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这就涉及到区域文化作用的条件和区域文化演变的问题。

(一) 区域文化促使经济起飞的条件

文化分析若脱离文化的外部制度环境的话,往往会得出莫衷一是的结论。比如,脱离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来简单的评价儒家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往往会产生矛盾的结论。为此,笔者在此提出一种文化环境论的观点,即当区域文化与全国的制度环境的实质相一致时,该地区的文化才会显现出巨大的经济驱动力,否则任何先进的区域文化都无法对本地的经济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文化虽然一直指导着温州人的行为,但由于温州文化不与当时国家的制度环境相符合无法发挥“发动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实行比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其他任何经济形式都被认为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尽管温州人很早就试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尽管温州人很早就开始从事工商业活动,尽管温州人不甘现状、勇于创新,但是,由于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宏观制度环境“锁定”了区域文化,从而使其不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温州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的文化,符合发展市场经济参与者关于“经济理性”的要求。当整个社会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时,温州的文化便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来。

因此,我们强调特定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区域文化与制度环境相一致的条件下展开的。当一种区域文化与制度环境不相吻合时,且这种宏观环境为强意识形态所控制时,制度环境将“锁定”区域文化,使之无法发挥积极作用。

(二) 温州文化的异化与温州经济发展

文化具有两面性，在缺乏有效的引导时会出现异化的现象。温州的创新精神和功利文化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的确为经济的繁荣产生过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当这种文化变成单纯的追逐经济利润的动力而缺乏相应的规范引导，文化就会变成促使人逾越道德法律底线和参与犯罪活动的主谋手。

改革开放后温州的民营经济蓬勃发展，造成繁荣的经济景象，但是，在缺乏有效的规制之下，温州文化一度“异化”，促使人们不择手段地追逐经济利益。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产品的形象和声誉出现危机。温州的劣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焚，在南京的销售专柜被消费者搞毁，继而被十多个大城市住处商场。1990年，整顿柳市镇的假冒伪劣电器曾经轰动一时，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这种异化的文化引导下产生的异化经济行为，毫无疑问会毒害经济社会的。

（三）温州文化的回归

当温州的文化已经异化后，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小于经济损失时，这种文化就需要各种内外力量以对异化的文化进行约束并使其回归到健康道路上。

1. 政府政策的影响

温州文化的异化导致的负面得经济效应，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市场失灵。或者说，没有规制的温州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囚徒困境”——个人不择手段追逐最大的经济利益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理性无法导致社会理性，由此才显现出政府的制度构建以及外部竞争压力的必要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政府开始对各种生产伪劣假冒产品的行为进行整顿。如，对温州柳市镇的各种劣质的低压电器生产厂商进行大规模的整改活动。政府对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防止伪劣产品外销。1992年温州市政府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引导民营企业树立质量意识，重塑温州想象。在打击犯罪活动的同时，政府还制订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规范经济活动行为和经济秩序，逐步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转移到合法经营的轨迹上来。

2. 外界环境的压力

来源于外部的环境压力也是促使温州文化回归健康的重要因素。没有外部消费者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抗议和谴责，以及来自高层政府的压力，单靠地方政府也许不能扭转经济被扭曲的状态。在温州假冒伪劣之风盛行的年代，温州市长办公室常常收到消费者寄来的温州生产的假冒伪劣品。1987年杭州武林广场发生的杭州人焚烧5000多双温州伪劣鞋一事，给温州抹上耻辱的一笔，引发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整改通知。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产品整改实际上就是由中央政府从上而下责令整改进行的。诸如此类，外部环境的压力对于推动温州经济文化的回归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3. 自身变革的需要

在发展市场经济之初，由于法制的健全、产品质量控制机制的缺失以及“摸着石头过河”心理，不法分子打破常规，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往往能够获得额外的丰厚收益。这种收益产生一种坏的激励，即制假售假。短期内，由于利润诱惑，必然使制假售假蔚然成风。这一退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温州文化异化的过程。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异化文化必然会导致经济扭曲甚至崩溃。面对“或生或死”的境况，温州人必然会产生自身变革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林门广场“焚鞋事件”发生后12年，又在此地发生一起焚烧伪劣鞋的事件，不过这次是温州鞋商焚烧从全国各地缴获的假冒温州鞋。从“造假”到“打假”的转换，说明企业自身生存的需要和选择。

四、结论

本文借助温州经济增长的现实,分析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本文强调的是区域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对经济学中的文化做出界定,认为文化是某一地区的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并认同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内化于人们内心世界并反映在人们行动中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方式和条件,认为只有区域文化所遵循的内涵与制度环境所倡导的价值体系相一致时,文化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激励作用,否则,文化的作用将被制度“锁定”。文化环境论对于分析同一种文化为什么会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文化又是一个演化的概念,反映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体现出其“双面性”——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个人理性无法达到社会理性,此时,政府引导对于遏制文化“异化”是必要的。文章对于文化的界定、作用方式和条件以及文化演变做出一些分析,但未能量化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同时,文章的分析意味着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培育健康的商业文化。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韦伯(彭强,黄晓京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2] 弗兰西斯·福山(李宛蓉译). 信任: 社会道德和繁荣的创造[M].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
- [3] 阿瑟·刘易斯(梁小民译). 经济增长理论[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3
- [4] 魏萼. 中国经济: 回顾与思考[J]. 经济学家, 1994, (5): 108-120
- [5] 刘晓凤, 任卫锋.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文化机理研究初探[J]. 嘉兴学院学报, 2004, (7): 20-23
- [6] 冯·哈耶克(邓正来译). 哈耶克论文集[M]. 北京: 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1
- [7] 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程克雄译).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的进步[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8] 高波, 张志鹏. 文化与经济发展: 一个文献综述[J]. 江海学刊, 2004, (1): 80-87
- [9] 张佑林, 陈朝霞. 区域文化精神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想性思考——兼论“浙江工业化模式”的形成机理[J]. 浙江社会科学, 2005, (3): 13-18
- [10] 胡宏伟, 吴晓波. 温州悬念[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Cultural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Study of “Wenzhou Culture” and Its Economic Boom

GAO Yanyan, YANG Deca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10093)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Wenzhou culture” and its economic boom, the article further studies the effects of regional culture on economic growth. Here culture is defined as a purely subjective concept. The study shows that “Wenzhou culture” plays a key role in its economic boom, but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can be prompted by its culture only when it is in coordination with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therwis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ulture on economy will be “locked”. Unconstrained culture may distort economy and thus needs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Key words: Culture; Economy growth;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